

案例

非法集资致2350万元汇票损失

事发地距江苏“宝马村”数十公里,企业、银行巨额资产无法追回

■ 特约记者 姚峰铭

“2350万元的汇票损失,打了9场官司,一审全部败诉。提起了一个二审,也败诉。剩下8个,打还是不打?”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宇公司”)董事长郑淑飞无奈地说。

2011年9月,距离江苏泗洪全民放贷“宝马村”数十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淮安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在10个亿的乐园非法集资案之后,2010年淮安市又告破一起亿元非法集资和案值高达数十亿元的非法汇票贴现案。但由于民间借贷资金的疯狂逐利和层层相连,案件虽然已经破获,但牵涉其中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却陷入无穷的纠纷。

高额利息、非法集资、企业拆借、汇票贴现,已经是目前中小企业应对资金瓶颈的一种常见融资方式,而一旦企业运转发生风险,资金链断裂且无法偿还本息,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还有不少企业主潜逃国外。

近期在浙江温州等地频频爆发中小企业信贷危机和地下资金链条断裂事件,而此类重大金融事件一旦爆发,将引发无数连锁反应,涉及的企业各方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将不可避免地蒙受巨大损失。

2350万元汇票追讨无门

“2000多万元的损失无法追讨回来,给企业带来了很大影响。”在淮安特大集资和非法汇票贴现实案,就已经有企业和银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2010年10月29日,江苏省淮安市中信电器公司法人代表周焯民,因许诺高额利息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并无力偿还,被淮安市楚州区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据悉,周焯民在不具备业务资格的情况下,以借款投资或经营需周转资金等理由,承诺支付月利率1.5%到8%的高额利息,向社会非法集资5426.4万元,其中最高的一笔借款数额达2200万元;此外,周焯民还以企业经营为由,向其他企业进行高息拆借,取得承兑金额高达数十亿元的汇票,他将部分汇票以低于原票值3%到3.5%的价格出售贴现,获取非法资金5913.8万元。

让郑淑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案虽然已经告破,但挽回开具巨额汇票造成的损失,希望却非常渺茫。

2009年,正是周焯民开展非法集资和汇票贴现的作案高峰。当年5月6日及以后数天,翔宇公司向周焯民开出总额为2350万元、到期日为2009年11月份的银行承兑汇票。而周焯民一取得汇票,就迅速离开了淮安。

4个月后,周焯民的资金链条已经断裂,本人悄然外逃。随着流言四起,进入9月份,涉案的借款人纷纷到公安机关报案,翔宇公司也紧急向淮安市公安局报案,并前往汇票开具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办理了汇票的挂失止付手续,并向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寻找持有汇票的利害关系人。

2009年10月16日,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交权利申报书,声明为该批汇票的最后持有人。10月30日,翔宇公司以“确认票据无效纠纷”案由,向淮安市清河区人民



2009年5月,翔宇公司向周焯民开具23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
2009年9月,周焯民外逃,翔宇公司紧急报案,并办理汇票挂失手续;
2009年10月16日,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声明为该批汇票最后持有人;
2009年10月30日,翔宇公司向法院申请汇票保全并提起诉讼;
2009年12月4日,宛城信用社向法院递交反担保手续;
2010年7月22日,翔宇公司一审败诉;
2010年11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翔宇公司败诉……

2350万元汇票追讨无门,手里只剩下8份一审败诉书,郑淑飞不知何去何从。 王利博制图

法院申请汇票保全并提起诉讼,认为被告宛城信用社未依法审查真实交易,存在重大过失,请求判决宛城信用社不享有汇票的持有人权利,汇票归原告所有。该案于11月2日正式立案,11月5日及6日,法院向汇票开具银行下发民事裁定书,停止汇票的支付。

2009年11月11日,因案件诉讼标的巨大,清河区人民法院将此案移交给了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11月19日,宛城信用社向法院提起复议申请,要求法院驳回翔宇公司的保全申请,并解除到期票据的保全措施;12月3日,淮安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接管该案。

2009年12月4日,宛城信用社向淮安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反担保手续。而此案,从此陷入矛盾。在开庭前6天,也就是2010年1月6日,宛城信用社成功从汇票开具行划走已冻结保全的资金。1月8日,宛城信用社提起反诉。2010年7月22日一审判决,翔宇公司完全败诉。

私刻的公章?

由于双方分歧巨大,翔宇公司随后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翔宇公司认为,宛城信用社在办理汇票贴现过程中,存在私刻公章、审批缺陷、涉嫌伪造资料、违规进行转贴现等问题,并由此认定宛城信用社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恶意串通虚假贴现等问题。

记者翻看卷宗材料,也发现公章大小不同的现象。对此,宛城信用社也出具了书面证据。在一份2010年9月8日提交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情况说明》中,宛城信用社承认,曾于2008年10月在原有公章的基础上又刻制了一枚外形较小的公章,后因业务需要,又刻制了第三枚单位公章。

同时,宛城信用社还出示了一份2010年10月25日由南阳市兴农公证处出具的第271号公证书,公证认定所有出具的三枚印章属实,进一步证明自己加刻公章行为的有效。

而按照严格的公章使用规定,同一个单位严禁私刻多枚公章,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监管漏洞,尤其是金融机构,在公章印鉴使用上更加严格。由

此,翔宇公司认为,宛城信用社因存在私刻公章的现象,不仅相关法律文书无效,且私刻公章实施的数十亿金融业务,包括转贴现协议等等,都存在伪造和虚假可能,应当无效。

购销业务虚假?

按照规定,企业持有汇票向银行申请贴现,须具备3个基本条件:在该银行开有正式账户、与出票人或上个持有者具有真实的业务关系、提供正式的业务合同。只有在这3个基本条件符合的情况下,银行才可进行审核调查,并经内部风险审核完毕后贴现。而为了防止虚假贴现等造假行为,银行在进行审核时,还需要申请人同时提供相关凭证,以证明该票据关联的业务交易确已履行。这些凭证一般都以增值税发票、发货单、运输单、提单等为主。

翔宇公司代理律师、江苏群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国建调查发现,在宛城信用社进行贴现业务的徐州邦盛商贸有限公司、徐州信得利商贸有限公司、新沂市群乐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徐州福农农用机械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不仅查询不到真实的业务活动,甚至邦盛、福龙等公司在贴现之前已经处于清算的阶段,有的企业一贴现完毕就注销了工商注册。

而这几家企业,在宛城信用社除了翔宇公司的汇票之外,尚有多笔贴现业务。3家公司的贴现业务共计30余笔,总金额高达近5亿元。

宛城信用社提供的贴现业务办理清单显示,翔宇公司的汇票被贴现,最早一笔发生于2009年5月7日,仅仅是翔宇公司开出汇票后的一天,此后的所有汇票均被迅速贴现完毕。

此外,记者和律师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那几家企业在汇票贴现时存出的虚假增值税发票。根据记者从徐州市相关部门调阅到的资料,邦盛等公司都没有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记录,而在办理贴现时却出现了两张发票号同为06165140的增值税发票。

此外,这几家公司在业务合同日

期等方面也存在多处漏洞,由此翔宇公司认为,宛城信用社在不具备贴现资质的情况下违法开展金融业务。

开庭前如何划走资金?

2010年7月22日的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宛城信用社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恶意违法贴现的情形,且支付了代价,翔宇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采纳。

但翔宇公司深感委屈并确定上诉的并不全是一审败诉,而是法院在开庭之前就将保全资金划给宛城信用社。

“2010年1月12日才开庭,在未知谁胜谁败的时候,法院就将资金划给了对方。”郑淑飞说。

记者采访和调查相关卷宗发现,2009年12月4日,宛城信用社向淮安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解除保全措施资料》申请,表示将“482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评估价:1240万元)为解除上述保全申请(总额为850万元)作为担保,并借此承担法律责任。”

而4天之后的12月8日,土地评估报告“宛宏建评字[2009]第586号”才正式出具。而宛城信用社还未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成功通过法院的反担保申请、审核,并顺利于2010年1月6日成功将翔宇公司的资金转走。

此后,为了这2350万元,翔宇公司在淮安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之间,有过多次奔波和交涉。2011年7月7日,淮安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翔宇公司在信访中提出的诸多不合理、不合法问题做出了答复,认为翔宇公司所举报的“案件承办人制造伪证”、“法院解除查封手续不合法”和“法院副院长行政干预案件审判”等问题失实。

2010年11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翔宇公司的第一起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宛城信用社擅自刻制公章的行为虽违反相关规定,但“得到该信用社的确认、均予认可”;在审核真实交易单据时“存在瑕疵”,但不是恶意重大过失;案件原审判决合法。

面对二审判决,郑淑飞拿着剩下的8份一审败诉书,又该何去何从。

纵深

胡福林回国缓解借贷危局?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听说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在温州政府和商会的协调下已回国谈判重组事宜后,阿林(化名)多日悬着的心这才稍稍平缓了些。

2010年,在温州经营一家小餐馆的阿林从朋友处得知,温州信泰集团正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融资并且“利息相当高”,于是将家中多年积蓄的20多万元借给了这家企业。半月前,当他听到胡福林因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而逃往美国的消息后,顿时感觉天塌一般。

实际上,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老板”之一。据《中国企业家》记者掌握的情况,截至目前,具有中国民营经济风向标之称的温州至少已有近百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且大多牵扯到民间借贷。

分析人士表示,资金链一旦断裂,风险会上游和下游传导,此情形与美国次贷危机非常相似。

老板“跑路”

“作为行业的领头羊,胡福林的出走对温州当地震动很大。”阿林向《中国企业家》记者介绍说,在整个温州眼镜企业中,信泰集团绝对是龙头企业之一。

《中国企业家》记者登录信泰集团官网了解到: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成立于温州,拥有十几家子公司。总部员工在3000人左右,并先后获得温州市“明星企业”、“浙江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

集团拥有完整的眼镜生产链,销往世界各地,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是中国市场上销量最大的太阳镜品牌。目前信泰集团进军新能源领域,生产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等光伏产品。

阿林还介绍说,他在信泰集团要债时,听一些供货商对胡福林“跑路”表示惋惜,另外他还听人议论说,信泰集团在外地还涉及房地产,具体情况说不上来。

就在胡福林出逃美国后不久,同样在温州,传出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9月27日,温州正得利鞋业公司老板沈某从温州市区顺锦大厦22楼家中跳楼身亡。这家产值只有5000多万元的企业,背负着各类融资贷款达1亿多元。

媒体报道称,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恶果。

近日在温州的网站流传着一份《近期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元不等,且多与“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有关”。

脆弱资金链

胡福林“跑路”的消息,再度引发社会公众对温州企业资金链的关注。

据悉,民间借贷成为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中小企业中,70%左右主要资金源于民间借贷。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二季度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在全国范围,去年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资金存量已超过2.4万亿元。近两年来这一市场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而相对民间借贷的奇高利率,大多数中小企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

一位中小企业主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表示,“这么高的利率,就是高利润的房地产也撑不住,资金链断裂是早晚的事。”

记者了解到,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峻的经济形势,温州多家中小企业纷纷转型。以信泰集团为例,除了眼镜业,还有太阳能光伏、房地产等行业。然而由于涉猎业务过多,光伏发电成本回收较慢,房地产业遭遇楼市调控,过大过快的投资规模使信泰资金链断裂。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高利贷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温州因民间借贷导致的破产情况非常严重且仍在蔓延。温州36万家中中小企业中已有20%歇业或停业。持同样担忧的人不在少数,多位温州经济企业界人士预言,随着年底春节还债高峰来临,“跑路”潮可能会愈演愈烈。处理不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一位浙江金融监管机构官员称,身陷高利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事,现在全国都有发生。据悉,继温州频现老板“跑路”后,浙江衢州、宁波也相继发生“跑路”事件。借贷风险高危区除了浙江,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

《中国企业家》记者了解到,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影响极为恶劣。这些“跑路”的老板所涉案金额一般达到了几千万、几亿,甚至十几亿元,向上向下传导的效应明显:上游方面,银行、担保公司都将受害,最苦的当属像本方阿林这样成百上千个底层放贷者,严重者可能血本无归。下游方面,企业供货商、原材料商受到损失。另外,我国沿海中小企业出口结构明显,大量工人失业,对我国出口也是沉重打击。

全民“炒金”乱象

有媒体曝出,信泰集团债务总额达20多亿元,其中12亿元为民间高利贷,月利息就高达2000多万元。而在这12亿元民间高利贷中,就有阿林的20多万元。虽然20多万元相对于12亿元来说是九牛一毛,可对于做小生意为生的阿林来说,几乎是全部家当了。

但像阿林这样的债权人并不在少数。阿林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自从胡福林“跑路”的消息传开后,债权人 and 供货商一下子涌来。夜幕中,信泰集团大门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来要债的。

据了解,温州目前民间借贷利率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2到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在“卖白粉”也没这么高的利润的诱惑下,很多和阿林一样的普通人纷纷涌入民间借贷市场。

温州经济界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投机暴利使得温州中小企业家偏离了起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有的甚至借高利贷炒房,终于酿成今日苦酒。

据《中国企业家》记者了解,民间借贷参与者众多,甚至有银行资金充当“二传手”。不少高利贷资金来源正是银行,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浙江很多地方公务员可直接向银行贷款50万元,公务员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后再投入高利贷行业。

业内人士认为,温州中小企业老板“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线索完全合乎逻辑。早先就有学者对这种炒钱行为提出警告,从今年8月开始,矛盾终于集中爆发。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界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表示,奇高的利率让普通放贷人、担保公司、大企业,甚至中小企业参与其中。中小企业逐渐远离实业,玩起以钱生钱击鼓传花的赌博游戏,同时充当借款人和放贷人的角色。资金链一旦断裂,整个民间借贷市场将出现雪崩。

怎样拯救危情中的“温州模式”

(上接第一版)

“救温州”就是“救中国”!温州资金出问题了,不代表只有温州有问题。救温州需要出快拳,将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金融市场是最容易发生“蝴蝶效应”的,现在“亚马逊森林中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了。从福建、广东、江苏,已经向中西部蔓延,连西北部的鄂尔多斯也已经传出危险信号。

温州的地方政府与企业负责人需要看到的是,采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只能缓解当前温州的严峻形势,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转型速度与日益增长的巨量资本要求增值这一历史矛盾。如何打通温州经济的脉络,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引导资本合理增值,是政府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拯救温州借贷危机与拯救“温州模式”应当同时进行。而后者则比前者更重要,也更有全国意义。首先,我们要弄清人们现在所说的“温州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弊端主要表现为:温州企业家家族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表现出适应性,以小商品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营模式,在强大的竞争对手

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缺乏诚信、惟利是图,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理念已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温州新模式可以概括为,通过集资形成投机资本,是一种投机行为的虚拟化经济和金融运作形式。

温州经济走上资本运作道路有其必然性。温州企业大部分为家庭式私企发展而来,不愿意进行垄断、并购,即使是股份制企业很多本质仍然是私营的,至今温州上市的企业只有10家,遍地小企业根本无法发展壮大。这样,既没有垄断资源又不吸收市场资金以投资进行企业转型,仅依靠资本运作是无法长期发展的,这是“温州模式”的悲剧。

显然,温州问题是一个中国问题。温州只是作为民营经济的代表问题首先集中爆发了而已。企业不务正业“空心化”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这种浮躁的做法在全国不在少数,温州的此次危情不仅为“温州模式”,也在为中国很多的企业发展敲响警钟。

“温州模式”不能垮下去,我们必须拯救“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曾经如“小岗村”一样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宣传对象。我们也不能挑拨鼻子竖挑眼地痛骂一顿便就要了,必须保持其精华

的弘扬与延续。把“温州模式”消极腐朽的东西清理掉,把“温州模式”积极的东西弘扬开来,这是各级政府和新闻媒体应持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应当有一个基本看法,温州的问题不能掩盖,当下要做到的是弄明白温州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就知道温州之于中国的意义。如果在解决温州企业民间借贷危局的同时想让“温州模式”获得新的生命力,走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恐怕要有一些新的思维。

一定要着眼于历史,而不是着眼于现在。银行多贷一些款,自然可以解决很多企业的燃眉之急,使得逃跑在外的人们敢于回到温州,把群众情绪稳定下来,社会秩序稳定下来。犹如救火的及时雨,此时非常重要。然而温州明天怎样发展,“温州模式”怎样去劣存优、去旧图新,这恐怕是一个历史课题。这自然包括振兴实体经济、企业规模做大做强、在持续发展上使劲,在科技创新上使劲。

一定要着眼于全国,而不是着眼于温州。温州的问题绝不是地区现象,如果为了救温州而作出非理性的政策调整,那中国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对待金融创新问题应当加快,采用疏导的方

法,但也不可过急过温,“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我们这样的教训太多了。2009年贷款大跌导致热钱流出过大和今年的通货膨胀,殷鉴不远,当以警醒。

一定要着眼于文化建设,不仅仅着眼于经济。精明莫过温州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疯狂的高利贷总有一天会断裂,要就在于温州人就行,只要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棒的就行。这一次,是自己自己套住了。这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从“温州模式”一开始出生时便潜伏下来的。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这不仅是经济模式的失败,而是思维模式的失败。温州人既要坚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又要破除投机天下先的思想。温州的企业家们要把精明之智用在实业上,用在科技上。温州人需要有一种思想文化的转型。

“温州模式”的创新方向在哪里,如何建设健康稳定的创新型企业?毫无疑问,这得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主线去寻找、去确定。

“温州模式”的创新最终要由温州人自己来决定。有一个大前提要明白:国家不支持投机取巧式的发展方式,要求振兴实体经济。具体怎样做,温州人精明得很,我们不必饶舌了。